

## 记忆·文本·视角——荆楚文化营小结

方宪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国学部讲师

在缥缈烟云笼罩的武当山顶，静静躺着明代自洪熙到嘉靖年间的石碑。武当山是道教圣地，多数满怀虔诚的人在经历了艰苦卓绝的跋涉后，只想尽快登上真武神庙所在的武当之巅“金顶”，而不会注意到，山径旁石洞中被摆放整齐的明代石碑。这些石碑，是明室历代帝王登基后遣使者敬告武当神祇而立，含有人间统治者向上天禀告即位就职的意味。碑文内容简洁庄重，600多年前的碑文一字一句仍清晰记载着明代帝王对于武当的特殊信仰。这是历史最生动真实的记忆。

“记忆”是此次文化营的讲座、考察中被反复提及的主题。胡晓真教授的讲座“明清文人纪游与南方土司的文艺之旅——从《容美纪游》谈起”提供了对鄂西地区土司如何通过艺文活动塑造政治身份、文化角色记忆的解读方式，通过清初文人顾彩的日记体游记《容美纪游》中所记载、展示的容美土司家族的戏曲演出、诗文创作等活动，将田氏土司家族置于“明末清初”的具体政治语境，抽绎出田氏土司在明清之交的历史时空中的政治心理异动及其特殊的艺文活动呈现方式，在远离中原政治文化版图的西南群山寨堡中，田氏家族不仅积极接纳包括明遗民在内的汉族文士，甚至以戏曲演出的精彩、戏班的精良作为文化权力的表征之一，迷醉于包括《桃花扇》在内的最具当下感的戏曲。容美土司寄望于通过这种文艺活动的方式塑造怎样的土司阶层文化身份记忆，顾彩等汉族文人的游记对于边陲土著的叙事又蕴含着怎样的“期待视野”及其塑造方式，这些都是贯穿于文本的问题。在对其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各个不同立场的主体在文本塑造中的身影，而正是这些不同的意图、策略、操作的碰撞，在文本中产生复调的声响，从而为记忆的塑造创造出更为开放的阐释空间。这也是记忆得以被不断刻画的基础。

另一个显著的案例是王明珂教授关于西南少数族裔“盘瓠”始祖传说的解析。盘瓠传说在中国畬、瑶、苗等族群中广为流传，成为族群的集体记忆。它解释了这些族群的族源，为犬神盘瓠即祖先信仰提供了支撑。自从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编撰《族群与边界》后，人们便认识到族群的意义不是关于社会生活或人类个性的基本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物，是社会构拟出来的关于某一人群的边界制度。族群是一个共同体，其基本维系来自成员共享的历史、文化、族源，这种共享并非历史本身，而是他们拥有的共同记忆。王教授关注的是：作为华夏边缘族群，被称为蛮夷的他们如何与中原王朝的叙述互动，如何在他者的叙事中

体验、回溯自己的历史，讲述先祖的故事，确认自我身份，并且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特定的、现实的社会功能？王教授敏锐洞察到，在族群的本土叙事中，他们一方面对始祖传说进行了偷梁换柱的改造，犬神盘瓠变成了华夏创世神话中的先祖盘古，另一方面，又利用先祖叙事作为反抗中原王朝征税的理由，这样一来，先祖传说叙事与地方记忆塑造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具有弹性的文本体系。

失忆或者忘却，无论对个体生命还是社会文化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纪念是希冀让瞬间凝固，记忆是期望使短暂永恒。田野考察过程中，碑刻文本与记忆也令人印象深刻。武当山明代碑刻带给人的震撼并非偶然，一路走来，识读被遗忘在蔓草、角落中的碑刻铭文是文化营的日常活动。碑刻是独特的中国记忆。今天人们说起碑，往往首先想到墓碑。然而，早在汉代开始，碑刻就主要用公共事业、公共场合，如山川祭祀、封禅这些公共场合，其主要基调是纪念和歌颂。从一开始，碑刻便与记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石刻因其材料易得、技术简便而远胜钟鼎，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普适性、广为人知的一种记忆媒介。文本是文学的生命，而在后现代史学话语中，历史即叙事的认知无疑更拉近了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将传世文献与田野材料的结合是此次文化营带给我的又一项新体验。

与先秦、唐宋文学逐渐关注物质材料如简帛文献、石刻文献等形成对比的是，明清文学研究学界目前仍将更多精力放在对传世文献的解读上，而此次，通过田野考察学习，更加深了我对于碑刻、铭文等物质文献材料的认识。武当山不仅有石洞中历代帝王的告祭石碑，拾级而上也随处可见普通民众、香客捐献的碑刻。从这些碑刻内容中，我们可以最直观、清晰地看到武当山在明代的特殊角色：从明太祖表彰到明成祖大力修建宫观、提升真武大帝的地位，这种传统被历代帝王所继承，武当山成为皇室道场，真武大帝成为明皇室保护神。同时，武当真武信仰也是明清时期的重要民间信仰，每年从河南、湖北、陕西等地的香客络绎不绝。国家宗教道场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是如何形成？地方社会与中央管理的互动是如何进行？香客的进香活动成为地方社会组织、流动的一种形式，而明皇室通过派遣中官管理道场、征收香税等方式介入地方社会管理，由此，我们看到一例民间与官方、地方与中央互动的生动图景。

这种地方化、基层性的观察视角贯穿于整个文化营的研习活动。王汎森先生在第一场讲座中就特别关注了思想史研究中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他对“从上至下”的思想史观察视角进行了反思，提倡“从下出发”。正如王教授所言，“从‘上’出发或从‘下’出发，观看事物的角度和视点是不同的。从‘上’往‘下’看的视野，和从‘下’凝视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虽然看的是同一件事，但立基点不同，所看到的也往往不同。在变动的时代里，我们可以将焦点放在‘地方’，看其信息如何传递，新的知识又在地方社群产生怎样的反应、什么样的信

息传递是通畅的、何者被人们接受、何者不被接受……对于这些，我们目前都还没有基本的了解”。而本次文化营的田野考察似乎正是在实践王教授的观念，无论是考察明显陵、武当山这样国家权力符号显著的宫观，还是参观襄阳汉水码头、山陕会馆这些地方商业社会气息浓厚的地点，同学们学习、讨论的关怀所在，仍是“在地化”的视角。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荆楚文化营”紧张、高效的学习考察过程中，我们瞻仰了学术大师的风采，感受了学科间的思维碰撞，收获了与良师益友的珍贵缘分。这是莫大的幸福。最后，衷心感谢每一位为此付出辛劳的老师、工作人员！